

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勃律与西藏苯教、藏传佛教关系考略

勃律是象雄西部重要邦国,公元八世纪始受吐蕃管辖,分裂为大、小勃律。历史上,该地区曾盛行西藏苯教,是苯教第二大世系喇嘛家族——竹氏家族的发源地。竹氏家族自勃律东迁至西藏阿里和日喀则地区之后,成为苯教后弘期宗教革新的中坚力量。勃律、竹氏家族与西藏苯教、藏传佛教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全面了解以象雄、吐为代表的藏族古代历史,客观辨析佛、苯关系,比较研究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政策提供了学术新视角。首先,作为苯教文化的“活化石”,勃律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缘地理优势及与西藏苯教竹氏家族之渊源,在古代象雄文明开放而多元的特点形成及苯教后弘期宗教革新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其次,西藏苯教与藏传佛教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五世、第八世班禅均出身于西藏苯教竹氏家族即为明证。再次,历代封建中央王朝的治边方略明显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与唐、宋、明等中原王朝对外施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软实力显著不同,元、清两朝的统治者将藏传佛教视为有效的统治工具。这些差异不但反映出“我国古代治边理论及其实践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同时也深刻映射出中国边疆各民族以宗教文化为纽带,不断融合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最后,八世班禅“惑习红教”事件与竹氏家族绝嗣,是清政府“独尊黄教以安众蒙古”治边政策的牺牲品。清政府采用“以番治番、以教治教”的边疆治理手段,欲借宗教之力制驭外藩,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僧侣集团互为倚重,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对藏、蒙地区有效统治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各宗教教派之间的矛盾。伴随着以格鲁派为首的宗教势力无限膨胀,教派之争不断演化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索,直接导致藏、蒙地区人口数量下降、劳动人口比例失调、社会生产停滞不前、文化思想保守封闭,对边疆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消极影响,这与古代象雄、吐蕃时期藏族历史宗教文化所呈现出的开放性与多元化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古代边疆各民族以宗教文化为纽带,进一步融合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刘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拉萨布达拉山李麟汉文摩崖的几个问题

李麟汉文摩崖位于拉萨布达拉宫所在红山东侧,是清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1720—1722年)入藏驱逐准噶尔部的清军将领李麟所刻。本文依据清乾隆初年成书的《西藏志考》所录碑(摩崖)文,结合仵军魁、邓锐龄二位先生的识读与考证,对此摩崖内容及时间等作了进一步研究,分析了地位不高的李麟当时为何能立碑刻铭,并指出了此摩崖的资料价值,尤其指出“西藏”一词作为特定地域名,康熙末年已在入藏清军中大量使用,在康熙《平定西藏碑文》前已见于碑刻,之后逐渐流行并固定化。(赵心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论更敦群培大师对藏文古文字研究的学术贡献

现在我们使用的藏文已有千年的历史。一千多年来,学者们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藏文对保存和继承古老的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在藏学研究领域中,关于藏文的起源问题,中外学者有很多讨论,到目前还没有一致性的意见。综合起来,学界主要有两大观点,第一种,公元七世纪上半叶三十年代,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文臣吞弥·桑布扎赴印度留学,吞弥在印度系统地学习了梵文,回国后仿效梵文创制了藏文,即现行的藏文;第二种,在出现吞弥·桑布扎创制的统一藏文之前,已经有文字使用,但并不统一。其实,这两种观点争论的焦点是现行藏文之前藏族有无文字的问题。更敦群培是20世纪以来在国际藏学界最具影响力的藏族学者之一,也是杰出的藏文古文字学家。他以人文史观为指导思想,运用现代语言文字学和考古学等学科方法研究古文字,撰写了很多的论著,成就斐然。尤其是其论著中关于创制藏文时所参照的印度文字、新增字母、藏文字体的流变等方面,从藏文实际出发、不迷信权威,用开阔的视野和语言文字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和论述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和支持。而且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为很多学者称道和借鉴。(更敦阿错,《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前吐蕃时代西藏西部丧葬习俗的考古发现及其特征

西藏西部前吐蕃时代的葬俗极具特点,包括了涂丹“尚红”“覆面”“结发”动物殉葬、分区而葬等特点,主要体现在重视墓室营建、盛行墓葬祭祀(尤为流行动物献祭)、擅长对遗体的处理三个方面。这些特点与敦煌文献关于吐蕃本教丧葬习俗的记载相似,说明后世文献关于吐蕃时期本教丧葬习俗受到来自西部象雄等地影响的记载是可信的。(余小洪,《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数学文化及其思想在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体现与运用

数学是对大千世界的高度概括,在这万千奥妙中也有不同民族对数学的理解和运用,其中藏族传统文化生命力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一方面是它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性,另一方面与它蕴含的数学文化和思想关系很大。数学文化及其思想长期能在藏族生活中重要运用,充分体现了藏族人民的智慧和科学精神,同时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藏族人民生活实践的需要和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文章分析了结构、变化思想在藏族传统生活文化中的运用;空间模型思想在藏族传统佛教建筑文化中的运用;度量思想在藏族传统工艺品中的运用;几何学思想在藏族服饰纹样图中的运用;几何、代数思想在藏族装饰品中的运用;概率论和运筹学理论方法在藏族博弈中的运用。认为数学一方面是计算工具,另一方面是可以用来展示民族心理。数学文化及其思想是藏族传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以人们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为源头,又反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研究数学文化及其思想在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体现与运用,既有利于我们传承藏族传统文化,而且对展现藏族独特的心理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很有帮助。(薛德军,范忠雄,普华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报)》2016年第4期)

再探藏族“囊玛”艺术的起源与称谓

——西藏聂拉木县充堆民间音乐实地考察与分析

囊玛是藏族民间发展到较高层次的歌、舞、乐一体的乐舞艺术。囊玛音乐具有较为完美、程式化的结构,固定、小型乐队伴奏的形式与乐器、男女人声之间的多声织体形态,以及端庄、典雅、优美的格调与舞蹈动律,使其成为丰富多彩的藏族歌舞音乐艺术中一颗璀璨夺目的艺术珍品。文章根据笔者在西藏日喀则聂拉木县充堆实地考察民间音乐时发现的当地柴鲁、羌鲁及果谐中存在的囊玛风格的歌舞音乐形式,以及现有流传于拉萨、日喀则的囊玛歌曲的原型乐曲与结构形式,参照相关历史、文献记述和历代民间囊玛艺术家有关囊玛艺术溯源的传说以及当地民间艺术家口述资料,特别是结合当地地域环境与音乐文化语境,从多维视角进行探索、分析,形成与以往学界不同的关于囊玛艺术起源、称谓的新认识,提出囊玛形成于今西藏日喀则西部聂拉木县充堆一带,由当地“柴鲁”“羌谐”等民歌演变而成;囊玛的称谓与当地特殊的地域环境、音乐语境直接关联;“囊玛”一词是“聂囊玛益谐”之简称;囊玛并非外来之乐舞艺术,而是西藏高原这块歌舞海洋中产生的神奇的艺术观点。(格桑曲杰,《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清初康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

清顺治年间,康区东部打箭炉一带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归附,根据当时及之后一段时间全国、藏区及四川地区的社会形势,清中央王朝主要采取政治手段保护已归附的土司,但明末已进入康区的和硕特部仍不断扩展势力。至17世纪末,打箭炉一带终被和硕特部控制,已归附清朝的土司亦被杀。在此情况下,康熙皇帝及清中央政府改变以往对和硕特部的策略及态度,决定在打箭炉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此即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此役时间虽不长,但双方投入兵力较多,在康区历史上规模空前,最后以清的完全胜利结束。此役之后,清直接治理雅砻江以东地区,康区政治军事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清治藏战略亦出现重大调整。(赵心愚,《中国藏学》2017年第1期)

阿里地区历史移民研究

迁徙是人类发展、进步和繁荣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通过迁徙来适应和应对青藏高原独特的气候和资源是藏族人世代生存于世界第三极的重要法则。自15世纪中叶以来,西藏阿里地区出现了以部落或家族为单位的自东向西的移民潮,并定居于革吉、改则、措勤以及仲巴等地,移民大多来自康区和安多地区(玉树、昌都、果洛等)。随着最初移民的成功定居,更多的安多和康巴人进入阿里,这种移民潮一直持续至1959年。最终,在阿里形成了以改则措巴、革吉措巴、仲巴措巴为核心的移民群,历经艰辛的奋斗与融合,成为羌塘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埃弗雷特·李(Everett Lee)提出的“推拉理论”分析移民的原因,认为藏东移民的主要“推力”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资源争夺以及政策性强迫移民有着密切的关联。“拉力”因素与羌塘地区的宗教资源、自然资源以及松散的社会管理制度等相关。藏东移民对当时的噶厦地方政府和地方民众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达瓦次仁,图纳·布莱尔,《西藏研究》2017年第1期)

30年代藏区社会对于红军长征的支持及其伟大意义

1935年4月,红军进入了藏族聚居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克服艰苦自然环境、粮食物资短缺等困难的同时,广泛开展了对藏区社会、僧俗民众的宣传、统战工作,通过建构藏族民众的“认同”以及建立与藏区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良好关系,红军得到了藏区社会在粮食物资支援、军事力量增强、政权建设推进等三方面的支持。三十年代藏区社会对红军长征的支持为红军顺利完成长征提供了保障,同时也成功检验了中共的民族政策,并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川,朱晓舟,《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